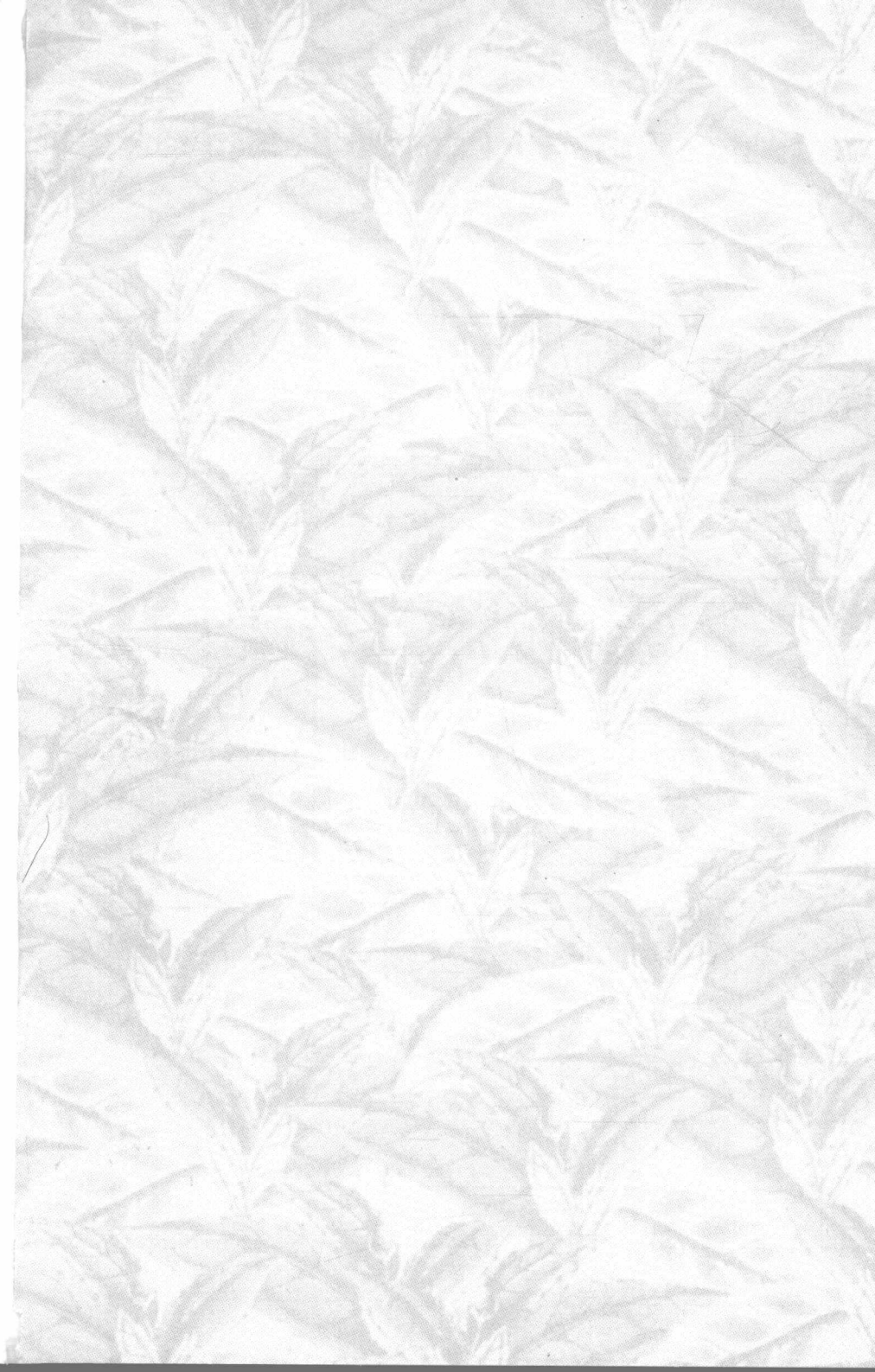


献给

永远无法读到这本书的

阿萨姆地区茶工





绿色黄金

茶叶的故事

从一本关于茶叶的故事
来看价值胜过黄金的茶
如何流传数千年，在无数地区
类的饮食文化历史

GREEN GOLD THE EMPIRE OF TEA

汕头大学出版社

艾瑞丝·麦克法兰
IRIS MACFARLANE

艾伦·麦克法兰 著
ALAN MACFARLANE

杨淑玲 译
沈桂凤

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人类学博士 李明璁 导读



导 读

一叶茶，见世界

李明璁（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人类学博士）

I.

150年前的某个寻常傍晚，英国北部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工人刚下班，和运转快速的机器搏斗了一整天后疲惫不堪。在刺骨寒风中回到窄挤的家，他迫不及待需要一大杯阿萨姆红茶。那双长满了茧的手掌，略有颤抖地握住热腾腾的杯子，配着硬冷的面包，这是当天唯一的晚餐，第二天继续拼命劳动的气力。

同一天，在地球另一端，北印度的阿萨姆丛林茶园中，当地的那葛族妇女顶着艳阳弯着腰，连擦拭额头汗珠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她必须满足英国管理者要求的速度：每天工作10小时，每小时摘取3000个茶菁；也就是说，每分钟50个。殖民地的生产尚未工业自动化，但茶园里的阿萨姆人已成为日以继夜的劳动机器。

这相当吊诡。当殖民母国里每日被剥削殆尽的工人消费越多的茶，那些在殖民地生产茶的、每日亦被剥削殆尽的工人就必须加倍地供给更多。结果，在英国开工厂的资本家赚到了，一杯杯便宜热茶支撑了员工每天再生产的劳动力；在印度经营茶园的殖民者赚到了，来自母国一批批的订单，使暴利源源不绝；甚至，就连新兴的广告业也跟着获益，他们忙着诱导甚至哄骗人们购买一包包的茶





叶。那是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火力全开的年代，血腥与甜头交织的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明兹（Sidney Mintz）说得好：“一位英国工人喝下了第一杯加了糖的热茶，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它预告了一场巨变，经济与社会的全面翻转。”

II.

在明兹“以糖论史”的经典著作《甜食与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 1985）中，论证了17世纪以降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糖业的发展，如何让糖从稀有的、英国上流社会的奢侈品，逐渐成为工业时代新兴无产阶级日常消费中卡路里的主要来源。糖能被一般民众平价而大量地消费，一方面降低了殖民母国内部工业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一方面则深化了殖民经济的剥削与依赖性格。如果说，明兹解开了“英国人为何与如何吃这么多糖”的谜，那么十多年后，大西洋对岸的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则透过本书，接续探问：“这么多的糖既然被放入茶杯里喝下肚，那么，茶又扮演何等关键的历史角色？”

本书是麦克法兰教授的第17部论著。去年圣诞前夕刚满63岁的他，是英国国家研究院（British Academy）与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皇家人类学会（RAI）名誉副会长和皇家历史学会研究员。他虽然不是我的指导教授，但很巧的，除了同在一系，我们还隶属同一学院（剑桥牛津独特的学院制，与负责教学的系所无关），甚至，我的博士论文口试也由他担任主考官之一。刚开始参与麦克法兰教授主持的讨论课时，坦白说我还真有点跟不上。他操着浓厚的英国腔，几无间断、“耳”不暇给地讲述，且经常是时空跳跃式地旁征博引，让资质不佳的我倍感吃力。有时稍一失神，





他老人家竟已从中世纪英格兰乡村的例子，讲到 19 世纪末日本城市的现代变革。和许多伟大而可爱的人类学家一样，麦克法兰教授也是个很会说故事的人，尤其是傍晚的课结束后，他会召唤大家一起到巷子口的“老鹰”酒吧续摊（五十多年前某夜，两位剑桥化学家就曾在这里，对着满屋子醉醺醺的酒客，宣布他们发现了 DNA ……）。在这颇富传奇色彩的酒吧里，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以及这位了解五湖四海的教授，七嘴八舌聊着关于自我与他者的生活种种，对我来说，有时竟比课堂上的收获还多。

如同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某次访谈中曾说，他的每部作品都有其个人生活的背景。这本广博讨论茶文化的佳作，也深刻镶嵌了作者的生命记忆与关怀。麦克法兰出生于北印度阿萨姆，一个拥有茶园和富裕豪宅的英国人家庭。他的童年就在茶园里度过，多半是美好悠哉的，毕竟他是老板之子。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从茶工辛勤劳动中所榨取出的剩余价值，变成了麦克法兰家族的财富，并让这位聪明的儿子得以回英国接受昂贵的教育。麦克法兰不负期望地进了牛津大学，并在 26 岁时即取得历史学博士。他的论文研究了 15 至 18 世纪英国乡间巫术（witchcraft）信仰的社会文化意义，正式出版后备受瞩目，甚至到了 1999 年还再版，被誉为相关研究的经典之一。然而，少年得志、大有希望成为历史学界新星的麦克法兰，却在此时选择了一条另类的道路：离开牛津，去伦敦大学再读一个博士。这次，他投入了人类学领域。

这几年一直尝试在跨领域间对话的我，曾好奇请教麦克法兰教授，什么因缘让他在当时做了“跨界”的决定。他简单明了地回答：就是遇到了几位关键人物，以及和自己生命经验的重新对话。





首先是他在牛津期间，除了专注于中世纪的史料，也被人类学大师伊凡－普利查（Edward Evans－Pritchard）的讲学深深吸引。伊凡－普利查在 1962 年所发表的《人类学与历史》，至今仍被视为“历史人类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即便连社会史大师彼得·柏克（Peter Burke），也曾回忆当年在牛津受伊氏启蒙甚多。伊凡－普利查宣称社会人类学也应该是一种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强调这两种学科之间并无重大区隔，只有取向（orientation）上的差异。而人类学者应采取以下两种观点来处理历史：（一）视历史为记载造成社会变迁的事件，（二）视历史为今日当事者思维中对于这些事件的一种表征。伊凡－普利查着重于开创一种新的方法论，但并未进一步说明，该如何在实际研究中巧妙衔接这两种观点。个人认为，就很大程度而言，麦克法兰日后的研究，乃至本书，都不断尝试着实践伊凡－普利查的理念。

其中更关键的是，麦克法兰一直希望能有机会重返并深入了解儿时的故乡，也就是飘散着浓郁茶香的阿萨姆席龙（Shillong）地区。只可惜当时因为那葛族独立运动所致之政治紧张情势，他无法如愿进入该地，只能以一个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的身份，蹲在邻近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详细整理了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奋勇捍卫茶园和英军阵地的 Gurung 族人的生活。于此同时，他也就近搜集了许多关于那葛族人的历史与文化资料，并开始与自己心中既清晰却又模糊的茶园生活经验对话。从中世纪英格兰的宗教生活，到近代喜马拉雅山区乡民社群的研究转折，很大程度地投射出麦克法兰的认同变化。与其说，他跨越了两种学术领域，不如说，透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实践，他超越了自己的族裔血统（英格兰白人），而回到他所心系的阿萨姆“原乡”。





1971年，麦克法兰受聘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史学研究员；4年后，他开始于该校社会人类学系任教。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英格兰的婚姻与爱情：1300至1840年的再生产模式》（*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Modes of Reproduction 1300-1840*, 1987年出版），整合了史学、法学、人口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及论述，在大西洋两岸的社会人文学界得到高度肯定，并因此荣获美国社会学会（ASA）所颁发最佳家庭研究著作奖。尔后，他在日本文部省和几个国立大学的邀请下，于20世纪90年代6度造访日本，除了客座讲学，也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纪录片拍摄。日本经验让麦克法兰的学术视野延伸到东亚，并由此开展一系列跨文化比较的工作。他研究了近代日本与英格兰的人口政策，也重新诠释比较明治维新之父福泽谕吉（1835-1901）与英国法理学家麦特兰（F. W. Maitland）关于“现代化”的论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饮茶文化在日本社会生活、乃至历史演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让出生于阿萨姆茶园、往后住英国长年“酤茶”的麦克法兰，逐步发现在这相隔遥远三地所生产与消费的茶之间，竟有着相当微妙、却也重大的历史关连。

III.

喜好园艺的麦克法兰教授在剑桥自家院里盖了一座日式茶屋，还辟了条仿京都“哲学之道”的散步小径。无数个午后他和母亲（艾瑞丝·麦克法兰，本书的第二作者）就在那喝着一杯杯的茶，念着记忆中的阿萨姆、谈着与茶有关的人事物。对麦克法兰而言，茶不再只是一种日常饮品和一段童年往事，而是一个促成世界样貌改变的关键物质。这是他近十年来穿梭于剑桥的史料馆、京都的茶道室、云南的茶树丛、阿萨姆的茶园等等“田野”（fields）之间，





所得到的启发，也是成就这部著作的坚实基础。在本书中，透过一则则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麦克法兰旁征博引、巨细靡遗地铺陈了关于茶与我们的前世今生。

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宗师霍尔（Stuart Hall）曾勾勒出一个“文化回路”（circuit of culture）的方法论，并以随身听为分析案例，研究它的五个方面：生产、消费、认同、规制（regulation）与再现（representation）。这五个方面表面上看来各自发展，但其实却错综交织、互为因果，投射出一张文化经济的大网。本书虽非采用此一架构，但麦克法兰教授所论及关于茶的种种，恰恰涵盖了这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下我就由此五个方面，概略性地萃取本书若干要点。

（一）**茶的生产**：首先是茶叶生产方式的自然史与社会史考察。从野生采集到被人类“驯化”栽种，从古代中国山林里小规模的茶田到近代北印度集中化的大型制茶工厂。茶生产的演进史，就是人类与自然持续辩证竞争的一个绝佳例证。然而，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重组。工业革命年代的殖民地茶叶生产体制宛如一座金字塔：极少数白人资本家掌控面积广大的茶园，成千上万的黑人劳工则在底层支撑。作者以极为鲜活、但却相当悲悯的笔调，大篇幅描述了当时的劳工如何被贩卖、运送，住在毫无安全卫生可言的地方，以及匪夷所思、超时超量的劳动负荷等史实，令人动容。

（二）**茶的消费**：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这么喝茶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直接摘取茶叶嚼食，直到中国人开始懂得浸泡





在热水中饮用。茶在中国最先普及，然后传到日本，在17世纪引进欧洲，最后在英国大受欢迎。其间，以茶叶压制捆绑成的茶砖，甚至在连接中国与西亚的丝路上，成为一种另类货币。茶刚来到英国时，和前文所提到的糖一样，原本是上流社会才能享用的奢侈品，但后来却逐渐成为不分阶级的民生必需品。如果没有茶，广大的帝国就无法维持健康的再生产劳动力。更进一步来看，即使在英国境内几乎人人皆有喝茶习惯，但正如社会学大师波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揭示的经典命题：文化消费的品味区辨对应、甚至强化了既存的阶级差异。麦克法兰在书中也指出，茶虽然普及化，但茶叶品质、味道的不同选择，乃至饮茶时间、器皿、礼节、甚至仪态等差异，处处都复制着“阶级”。

（三）茶的规制：与茶生产相关的规制，显现于殖民地茶园中一连串的管理措施。为了让产能发挥到最大，军事化的劳工控制、科学化的效率计算与经常更新的栽种技术，不断被强加至茶园的劳动人力与自然环境中。与此相反的，则是少数秉持人道主义关怀的殖民地行政官员，尝试要改善茶园里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于是，不同立场的规制力量在茶的生产行列中展开争斗。

（四）茶的认同：饮茶文化作为一种认同型构，首先以“英国人国民习惯”的姿态，与欧陆咖啡文化做了区辨。作者尝试从政治、经济、社会等面向，回答这个习惯差异养成的结构性因素。事实上，这一切都与上述茶的特定生产和消费脉络息息相关。其次，在英国，相对于咖啡和啤酒的消费群众多半是



男性，喝茶则是一种跨性别与年龄的日常活动。在女权未彰的那个年代，中产阶级妇女藉由小型的家庭下午茶会，型塑出一种与男性酒吧或咖啡沙龙有别的小社群认同。

(五) 茶的再现：茶不只是用来喝的，其附加价值与各种文化再现也值得深入探究。事实上，无论在中国、日本和英国，都有为数众多珍贵的、属于各自文化与不同时期的“茶经”，论述着茶的疗效、仪式、美学，等等。例如在书中被细腻讨论的日本茶道，就是将茶从单纯饮用的日常行为，提升至一种拟宗教的禅学修为层次。此外，茶的大量消费也诱发新的文化生产。有史以来第一则在伦敦刊登广告的商品就是茶；茶也促进了英国陶瓷艺工业的繁荣，尤其是在艺术价值上的精进。

VI.

在刮着呼啸北风、夹杂着些许冻雨的剑桥冬夜读完此书，头脑里胀满着，仿佛刚从一趟丰富精彩的“见学旅行”中返家。然而，这似乎比较是知性层次上的收获。但我的内心，竟隐隐有着一一种情感层次上的缺憾。我想是因为，书中某几章关于阿萨姆茶工劳苦的生活意象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其实麦克法兰教授不是个立场激进、以批判殖民主义和劳动剥削为职志的“左派”，但透过他细腻而富同情心的描述，我们得以清晰看见，那些在阿萨姆烈日下，弯着腰与殖民命运搏斗的茶园劳动者的面容。

麦克法兰教授一方面肯定了制茶工业在英国殖民者的开拓与组织下，成为日后北印度重要的经济命脉。但同时他却也犀利指陈，无论在殖民或后殖民时期，劳工生活的条件一直不见改善。资本主





义生产与消费固然带来社会新生的契机，但放任市场机制的后果却非公平正义，而是层层剥削。麦克法兰的母亲和他本人，近年来就带着这样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主义（或许在左派人士看来实在不够“进步”、无法“治本”），以一种素朴的人道关怀，持续为阿萨姆（目前印度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在提升教育与组织结社等工作上提供协助。

让我们翻回本书的最前头，静心感念那两行躺在扉页上的话：“献给永远无法读到这本书的阿萨姆地区茶工”。在这个殖民时代已远、但世界不对等的生产与消费体制仍重重压迫着地球上大半人口的“全球化”年代，在这篇导读的最后，如果我也能许个小小愿望、献给谁人，那么就请窗外那片夜空，给予仍在世界角落每个“血汗工厂”（sweatshop）里的劳苦人们安详与希望。或许有一天，他们或他们的子孙，都能捧着一杯热茶，和你我一般，幸福地读着此书。



中文版序

对我们来说，能够把我们的书介绍给历史上最伟大的产制茶叶和喝茶文明的中文读者真是件荣幸又令人高兴的事。我们想藉着撰写本书，向读者述说茶叶对中国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茶一直都是中国文明强盛伟大的重要原因，但最后因着它所招致的渴望和它所给予中国人的气力，导致了非常糟糕的灾难，让我们解释给大家听。

茶如何成就了中国的强盛和伟大

茶（*camellia sinensis*）源自于东喜马拉雅山区里酷热且潮湿的丛林中。正当中国于公元前3世纪的统一之时，茶就已经在中国修道院僧侣的花园里和贵族士绅的家里栽种着，茶被视为一种神奇的药和饮料，并有助于佛教修行的冥想。

茶大约在唐代兴起时变成举国上下都喜爱的饮料，公元9世纪至13世纪，随着晚唐和宋代的中国版图与文明南移，茶向南方传播开来。

本书中提到的一个论点是，第9至13世纪人口突然急速增长和经济发展而累积的财富，以及劳力密集的水稻文明在长江三角洲传播，都因为茶叶而成为可能。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茶饮提供了耕种时所需的精力。茶里的咖啡因使肌肉放松，并使肌肉更有力气，让肌肉能够更加运用自如，同时也让大脑集中精神。茶能消除疲劳，让人们能够从事更复杂和困难的工作，如果我们把茶从唐宋文明中剔除，唐宋就不可能有如此高度发展的文明。

第二，因为中国的人口急速地增加，中国很快就面临到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宋代大城市兴起和人口稠密的乡间都制



造出大量的废弃物——人类的排泄物，这污染了水的供给，危及王朝的生存，之后霍乱和伤寒又迅速增加，新生的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可能死亡，成人也持续不断地染病，面对这样的威胁，人们可以做什么避免这样的灾难发生呢？

在中国并没有其他明显又立即可用的替代品来代替污染的饮用水。饮用奶类在巴斯德发明杀菌法前也是很危险的事，此外，也没有足够数量的产乳动物能提供如此多的人口把奶类当作主要的饮品来喝。若把啤酒或酒类当作饮料，要供应每人每天平均所需 1.3 至 1.7 升的液体补充的话，啤酒或酒类酿造会消耗太多的谷物。

茶饮的发现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意外之一。把一片容易栽种的叶子放到滚沸的水中就可以制造出前所未有的便宜饮料，既安全又好喝。如果拿不到叶子本身煮茶喝，也可以用煮沸过的水来代替。

茶是所有饮料中最安全的，原因有二。第一，将水煮沸这个过程可以杀死很多种细菌，若要马上喝煮沸过的水，持续滚沸至少 5 分钟，杯子就会接近无菌状态。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它还是另一项对人体健康的保护。

在早期的中国典籍中，茶被描述成是一种药，就好像人参。据说茶的味道比较好，并且会释放出对多种疾病有益的物质，茶能治愈的其中一种疾病是“因喝水而引起的疾病”，茶被认为具有某些杀菌的成分。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就能发现了解这整件事所需要的线索。我们追随所有的环节始末，从以水传播的疾病到茶饮本身，然后发现了茶里头的众多化学物质，茶叶里所含最多的物质叫做“茶单宁”（tea tannin），茶单宁在化学上一般称为酚醛，酚醛是人们目前所知具有最强杀菌功效的物质其中之一，酚醛是构成石碳酸杀菌剂的基本物质，石碳酸杀菌剂在 19 世纪彻底地维持了医院的清洁。



19 世纪末当显微镜发明后，人们得以发现细菌，也能够进一步测试茶所能带给人们的影响。实验显示，当把伤寒、痢疾和霍乱病菌放在冷茶溶液中时，它们都会被杀死，并不是煮沸的水杀死这些病菌，而是茶里的某种物质，所以当人们喝茶时，他们不仅喝下了经过杀菌的水，也喝下了一种可以清洁口腔和保持胃部健康的物质。

所以中国人发现的是茶这个具有强大疗效的药，中国人也是第一个记录下茶疗效的民族，能够减轻大脑、心脏和身体的许多种疾病。

茶如何导致中国悲惨的命运

茶同样也为中国带来了一些可怕的灾难。我们并未把第一件灾难放在书中讨论，因为我们的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但我们在这里解释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认为读者有可能会提供其他进一步的证据，证明或驳斥这其中的关联。

西藏早期是世界上喝茶最多的地区之一，大部分依赖沿海和云南一带运输到当地，无论是过去或今日的藏人，若没有了茶，藏人的高度文明就不可能发展，就像茶在丝路上所扮演的提神物和精力来源的角色一样。然而，引起我们兴趣的是，茶对其他中国边界游牧部族所带来的可能影响，尤其是蒙古人和满族人。

和其他东西相比较，茶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一杯未经处理的绿叶所含的维生素 C 比一杯柳橙汁还要多。经过处理后的茶叶含有的酵素能增进其他绿色蔬菜维生素 C 的吸收，因此很早就有人注意到茶能够有效防止坏血病，在绿色蔬菜非常缺乏的草原地区，这一点很重要。

茶里的咖啡因能给人们提供精力，尤其是在寒冷的地区，此外，茶还提供了保护，帮助人们对抗多种疾病，特别是经由水传播的疾病，成效卓著。





大量的茶叶消费可以视为 12 世纪蒙古强权成长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吗？蒙古人的崛起和茶叶之间的关系先前并没有人真正的解释过。毋庸置疑的，我们在北京一个展览上收集到的资讯显示，茶在一些最近出土的边疆城市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曾经大量饮茶。中国学者曾经讨论过一种可能性，早期惩罚蒙古人的方法很可能就是切断他们的茶砖来源。

如果这项猜测是事实，那么成吉思汗（Genghis）与忽必烈（Kubla Khan）征服中国和建立元代的大业就很可能和茶叶有关。之后女真人崛起、入主中国并建立清政府，相当程度上也和茶叶有关，如果没有这个来自小树丛的叶子，我们很难想像这些边疆民族所建立起的强大帝国会存在，当然，这项假设仍有待大家讨论和进一步的研究。

随后的不幸

无疑地，茶为中国带来了另一波巨大的浪潮，这影响可从两方面谈起。第一个影响发生在 19 世纪初期。英国人在 18 世纪晚期开始喜爱喝茶，且为茶叶深深着迷。东印度公司的财富就是因为进口茶叶，创造了巨额的财富，有人认为，英国之所以能拿下印度并在法国的殖民和政治角力中获胜，依赖的就是茶叶创造出的财富。

然而对英国人来说，却有一个大问题。英国人要用什么来支付这个让人上瘾的茶叶呢？英国人所作的所有努力，试图要把茶叶移植到英国人的殖民地都失败，一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才成功。公元 1780 至 1840 年对英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英国人在这段时期内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英国人依靠的就是中国茶叶。

起初，银用来支付茶叶，但随着进口茶叶的量越来越大，需要





的银也急剧增加。墨西哥的银矿因 1776 年美国从英国分裂独立出去而遭切断，银价下跌，再加上中国人觉得他们已经有够多的银子等原因，都让银这项交易用的货币渐渐地不再通用。另外有什么东西能让中国人愿意用来交换茶叶呢？看样子似乎是用重药——鸦片来交换茶叶的适当时机到了。

鸦片的故事由此开始，这是三方交易，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中国茶叶运至英国（有些银开始回流），银运到印度用以支付鸦片。随后中国人试图结束这项交易，悲惨的结局——1839 至 1842 年的鸦片战争——发生了，鸦片战争后的巨额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等条约众所皆知。中国这个强权遭受英国人的摧毁和挑战，开启了清朝的衰败，茶叶和鸦片两者互相纠缠，也只显示出清政府的腐败和空洞。

第二个悲惨的影响发生在同一个世纪稍晚。英国人想要为自己赚取茶叶的利益，所以他们开始在阿萨姆和锡兰种茶。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他们已经透过使用机器和便宜的运输等方式开始削弱中国的茶叶市场。1897 年，据报导在 25 年前，光是厦门一地就有 65800 司马担（约等于 400 万公斤）的茶由此出口，但到了 1897 年，只有 12 司马担，约相当于 720 公斤的茶由厦门出口。4 年之后，再也没有茶叶从汉口（武汉）输出。茶叶贸易终于完全崩溃。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变是 20 世纪初中国衰弱颓废悲剧的背景因素。

其他的影响

我们已经讨论过茶两项吸引人的优点——增强气力和增进健康，但还有第三项特点就跟前面两点一样重要，我们也必须提及，这跟茶作为一种仪式性饮料有关。

我们喝许多饮料的方式很简单，倒入茶杯或玻璃杯后，用嘴喝

